



中华五千年名人传记丛书

西汉盛世人物

买丽萍 主编



解读历史人物
镜鉴现实人生

华文出版社

西汉盛世人物

买丽萍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汉盛世人物/买丽萍主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 11

(中华五千年名人传记丛书/张大可、邓瑞全主编)

ISBN 7-5075-1602-4

I. 西… II. 买… III. 历史人物—列传—中国—西汉时
代 IV. K820.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915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95.25 印张 266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全套 12 卷): 198.00 元



■ 主编简介

买丽萍 女，回族，1962年生，新疆乌鲁木齐市人。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甘肃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西域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唐代文化中的西域文化因素》、《回族穆斯林的临终关怀及其积极意义》、《中国石窟寺艺术渊源简论》等学术论文多篇。合作论著《20世纪世界政治风云钩沉》，任副主编。完成省级科研课题《西域·石窟艺术与文化交流研究》。



中华五千年名人传记丛书

- ※ 春秋战国人物
- ※ 楚汉相争人物
- ※ 西汉盛世人物
- ※ 三国英雄人物
- ※ 隋唐之际人物
- ※ 宋元明清人物
- ※ 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
- ※ 五雄主的晚景
- ※ 五太后轶事
- ※ 智慧与谋略人物
- ※ 历代十大名伎
- ※ 历代宦官

责任编辑：张惠军 马 丽

责任校对：晨 钟

插图绘制：刘 坚

装帧设计：



中华五千年名人传记丛书

编委会

丛书主编：张大可 邓瑞全

丛书编委：（依姓氏笔画为序）

马素娟 王炜民 田志勇

买丽萍 张惠军 李清凌

杨志武 汪小军 段小强



中华五千年名人传记丛书序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五千年文化，系统记载这一文化发展的就是卷帙浩繁的纪传体正史。我国历代蝉联而下的纪传史积数有二十六种，四千零四十二卷，洋洋四千五百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黄帝迄于清末，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纪传体正史是以人物为中心叙事的，它创始于《史记》。人物传记有专传，有合传，有类传，有附传，在正史中称“列传”。本纪编年载国家大事，它以帝王为中心系年，可以视为帝王的传记。年表纬人、纬事，也是以载

人为中心为主要内容。以人为本叙述历史，在古代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看来，以人为本位来叙述历史，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易于普及，启人深思，仍有许多长处。历史人物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若将其中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写成新型传记，对于普及历史知识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目的，我们将正史所载各个时期的典型人物从春秋到清末选编成一套丛书，定名为“中华五千年名人传记丛书”，以适应社会广大干部和知识青年、学生的需要，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这套丛书，不同于学术界的各种历史名人传记。入选人物不单是正面人物和历史名人，也选反面人物和知名度不高而有代表性的人物。传记分两种类型：断代人物传记，以事为中心。例如《三国英雄人物》，就以反映三国鼎立的事件为中心；贯通人物传记，以类为中心。例如《五太后轶事》，即以历史上擅权的太后，作贯通的比较而组织的。所以每一本传记，都有一个主题，以启迪人们对于历史的反思，从中受到教益。在写作上，文艺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不虚构，据正史记载实录评述。人物传分短篇和中篇两种，一般为短篇，每本书评述历史人物四十至五十人，每个人物二、三千字或四、五千字，大传人物六、七千字。中篇人物三、五万字，每本五至十人。行文力求畅达，夹叙夹议，文中加醒目小标题，或单题，或双题，以增加故事性，增强可读性。

本套丛书规划十二卷，每卷 20~25 万字，全套丛书约 266 万字。书目如下：

(一) 断代人物传六种：

春秋战国人物

楚汉相争人物

西汉盛世人物

三国英雄人物

隋唐之际人物

宋元明清人物

(二) 贯通人物传六种：

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

五雄主的晚景

五太后轶事

智慧与谋略人物

历代十大名伎

历代宦官

以上两种传记，版式一律，统一编为共十二卷，断代人物六种列前，贯通人物六种列后，两者在目录版式上加以区别。

这套丛书的前身，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张大可教授发起，邀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谭良嘯合作，组织了一套“中国历史人物评传丛书”，首先推出断代人物传记“三国人物评传”和贯通人物传记“五太后评传”，出版后反映良好，普遍认为是雅俗共赏的好书，有的中学历史教师将《三国人物评传》列入向学生推荐的阅读书目。

嗣后陆续推出数种，因事计划中断，一晃就是近二十年。这次在华文出版社的建议下，重新组织，构成贯通五千年的中华英杰人物传记丛书，故定名为“中华五千年名人传记丛书”由张大可、邓瑞全两教授主编，贯通全稿。丛书十二卷，每一卷一至两位主编，负责分卷统稿。丛书主编与分卷主编组成编委会。原有的作者队伍基本不变，新增人物与改写人物邀请新作者撰写。作者基本队伍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和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大都为高等院校的历史教师，部分作者为成都市武侯祠研究人员。一百多位作者遍布全国，藉此学术工程，“以文会友”，增进联系，增强学会凝聚力，也可以说是学会的一种交流方式。作者署名在每一卷丛书序中列出，同时列名于所写传记文章之后。本书选入西汉盛世人物四十三人。主编买丽萍撰稿十一篇。张大可撰写“序论”。作者二十三人，依姓氏笔划序列如次：买丽萍、刘京华、刘剑秋、张大可、张金龙、张德芳、张宁、李兆成、李家发、杨代欣、芮葭白、何红英、汪受宽、胡莉、赵彬、赵生群、郝树声、俞樟华、梅铮铮、彭建平、舒大刚、谭良嘯、戴惠英。华文出版社提供出版支持，也是对学会活动、学术工作，以及对各位作者的极大支持。丛书责编张惠军同志贯注了极大的热情。甘肃天水师院美术系教师刘坚提供插图。借此丛书出版的机会，学会及丛书编委会向全书作者，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丛书编委会

2003年10月

序论——巩固大一统 中央集权的新世纪

秦汉大一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试图治平天下的一种尝试。秦始皇满怀信心要传之万世，想不到二世而亡。新制度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西汉王朝向何处去？这是统治阶级面临的重大课题。汉初陆贾作《新语》，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陆贾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解决，他只总结了秦施暴政而亡，要求汉初的统治者无为，给人民休养生息。无为、休养生息，

是客观的形势。这只是施政之标，而还不是长治久安之本。理论上的总结，在贾谊手中完成。汉武帝时，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一整套大一统的理论，建立了三纲五常学说，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众所周知，兹不赘。这里着重谈一谈西汉初的思想政理论家的先驱者贾谊的思想。

汉文帝时，西汉政权已经稳固，人民生活粗安，正向小康之世发展。秦汉对照，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西汉向何处去，贾谊作出了理论的回答。他向汉文帝上书《过秦》，通过总结秦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肯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进步性，同时否定了个人过度集权的暴虐政治。贾谊指出：“今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中央集权制度，符合历史潮流，人心所向。那么秦朝为什么灭亡了呢？贾谊总结了三点原因。即《过秦》上、中、下三篇。（一）“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二）“危民易与为非”；（三）“壅蔽之伤国也”。贾谊认为“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取与守不同术也”。秦始皇用暴力统一天下，但不懂得用仁义治天下，而且变本加厉实行暴虐专政，秦二世因之不改，把全国人民推入火坑。所以陈涉起义，“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又由于秦朝“多忌讳之禁”，皇帝拒谏，没有人出来尽忠，秦朝也就不可避免地灭亡了。《过秦》是西汉时代理论界评价秦朝政治得失的一篇定论之作，兴亡之理，分析透彻，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使人深信不疑。唐柳宗元作《封建论》，总结秦朝之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正是贾谊思想的阐发。

贾谊的论断，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制度，而改善政治，使人民安居乐业。贾谊随

后发表的《大政》、《治安策》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大政》指出，立政之本，在于养民。《治安策》针对西汉政治已呈现的积弊大声疾呼：“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他所痛哭、流涕、太息的内容，总括起来就是“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即诸侯王僭拟，匈奴数侵边，制度疏阔三大社会问题。汉初全国六十二郡，朝廷直接控制的才十五个郡，诸侯王封地四十七郡，……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伴随诸侯王日渐长大，必然引起地方和朝廷的对立。西汉王朝象一个手脚得了肿胀病的人一样，小腿胀得差不多像腰一般壮，指头肿得差不多像腿一般粗，再不赶快医治，就要成为死疾。“可为痛哭者此也”。汉初和亲，每年向匈奴输纳大量财物，委曲求和。但是匈奴百约百叛，贪婪无厌，连年侵边，弄得京师时常告警。贾谊批评“和亲”政策丧失国威，使天下形势如首尾倒悬。“匈奴，足也，反居上；汉朝，首也，顾居下。”这种局势，“妨害帝义”，影响中央政权的巩固，“可为流涕者此也”。最为严重的是，由于法制疏阔，权贵豪强，商人大贾势力膨胀，役财骄溢，兼并掠夺，农民失去土地，逃亡四方，国家无积蓄，齐民无盖藏，一遇水旱，民众就要卖爵鬻子。贾谊发出了大声的呐喊：“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论积贮疏》）“可为长太息者此也。”由此可见，《治安策》对于西汉王朝在升平景象下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的分析是何等的深刻和预有远见。

贾谊指陈时政，慷慨激昂，锋芒毕露，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对现实的社会矛盾作出深刻的分析，旨在完善制度，“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贾谊所提出的具体治世方案，如“割地定

制”，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对外主张抗击匈奴，积贮御边；对内健全严格的等级制度，巩固封建秩序；平抑物价，打击豪强，国家铸铜钱以御轻重；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等等，文帝、景帝、武帝相继施行。贾谊的这些主张，固然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健全和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削弱诸侯王，抵御外族入侵，要求改善政治，抑制豪强商贾，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无疑地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当然是进步的思想。从历史观点来看，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新制度，是在西汉盛世下巩固的。所以西汉盛世，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大王朝，而且是一个完善和巩固新制度的新纪元，它对于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来评价西汉盛世，当然不是赞美独裁专制，而是从历史观点的角度赞美这一个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新世纪。西汉盛世之所以能够出现，不是由于它的独裁和腐败，而恰恰是在大一统制度下的开明政治取得的。从文景之治经武帝独裁到昭宣中兴，西汉盛世呈现马鞍型发展，不就生动地说明了这样的问题么！

二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朝的暴政，西汉统一，民心思治，农民阶级要求休养生息，安定社会，保护战争的胜利果实。农民希望回到田园上去生产，要求新王朝废除暴政，减轻徭役赋税，这是在新形势下农民阶级斗争的新内容。西汉统治者适应了这一形势，调整了治国方针，出现了汉初的无为政治以及前

期的文景之治。

刘邦入关，约法三章，表现了救民于倒悬的动向。于是天下归心，刘邦取得了胜利。

约法三章，只是一个序幕。序幕一开，秦民唯恐刘邦不王。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还定三秦，立即颁布“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高帝纪》）的法令。田者，耕作也。刘邦承认农民占有土地，有耕作之权。接着又在他所控制的蜀、汉、关中地区颁布了免租、赐民爵以及减轻徭役的法令。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西汉统一，在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以功劳行田宅和复故爵田宅诏（《汉书·高帝纪》）。这是治理全国带纲领性的文件，有如下一些内容。

第一，“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诸侯子居留关中的受到加倍的优待，这是为了减轻安置和监护六国贵族后裔的阻力。接着刘邦强徙六国贵族后裔于关中，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这条措施在客观上减轻了关东的地主阶级兼并势力，对农民是有好处的。

第二，“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陈涉起义之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陈涉世家》），可见，脱离田园的“聚保山泽”之民是相当多的。刘邦用“复故爵田宅”的办法来分化瓦解“聚保山泽”之民，目的是对农民“书名数”。颜师古注：“名数，谓户籍也”。

第三，“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免为庶人。”这条法令是国家和各别地主争夺劳动力，增加国家的剥削对象。高帝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高帝纪》）。惠帝六年

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奖励增殖人口与释放奴婢是密切联系的，就是因汉初人口死亡过半，土地荒芜，国家迫切需要劳动力，所以制定了释奴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遣散士兵归农，“以有功劳行田宅”。

第五，各地小吏趁战乱占夺了许多土地，也得到了诏令的承认。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高帝五年诏是统治者颁布的一系列调整阶级关系的政策，可名之曰调整政策。它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社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接着，刘邦又和他的创业之臣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人提出了和亲、分封、与民休息的总的治国方针。

“和亲”是对匈奴实行的“妥协让步政策”，这对于大乱之后初建的西汉王朝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政策认真执行了七十年。这正是西汉治国的七十年。

“分封”在当时中央集权还不巩固的情况下，同姓王起了屏卫京师的作用。在经济上边郡封王，使人民纳赋役不远离乡土，有利于经济恢复。故淮南之民“甚苦属汉而欲王。”（贾谊：《新书·属远》）

“与民休息”是鉴于秦亡的教训，而实行的安定政策，即无为政治。所谓“无为”，就是约束君臣不要“举措暴众”、“用刑太极”，让农民能够在田园上生产。

刘邦死后，高后、惠帝统治的十五年，在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人为相的治理下，认真实行，人民衣食逐渐滋殖。

诸吕之乱平定后，西汉政权得以巩固，历史进入了文景之

治新时期。

文景之治是西汉政治上的开明时期，它是在贾谊、晁错等政论家提出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贾谊的《治安策》、《过秦》等，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长治久安的思想。文景时期的开明政治，正是地主阶级求长治久安的意志表现。

汉文帝颁行举贤良方正开明政治的集中体现。

文帝二年下举贤良诏，十五年再举贤良，完善了这一制度。举贤良的标准是：（一）明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始终；（三）能直言极谏者。文帝亲策求言的内容是：（一）朕之不德；（二）吏之不平；（三）政之不宣；（四）民之不宁。

贾谊、晁错、贾山、袁盎等人都不是公卿大臣，但他们都能向文帝直言极谏。贾山“其言多激切”，而文帝“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汉书·贾山传》）。晁错上书言治，引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赐书褒奖：“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汉书·晁错传》）从史书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文帝君臣言“治”之切。君主望治国建久安之业，求贤相良策；而群臣匡扶，敢直言极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期地主阶级开明政治的特色。

秦王朝极端残忍的个人集权，闭塞言路的愚民政治导致了破家亡国。“文景之治”的开明政治，君主虚己纳谏，却进一步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

文景之治在刑政经济上的政策就是约法省禁与轻徭薄赋。

汉文帝的“约法省禁”主要内容是两个 方面。第一，废除一些严刑苛法，如诽谤妖言法、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减轻笞刑等等。第二，“赦罪人，平狱缓刑。”